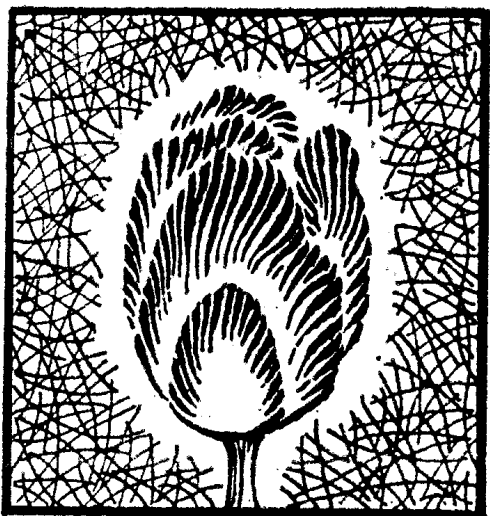


柳 匪 五



马尔罗研究

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漓江出版社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出版说明

本丛刊以编译介绍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任务，内容包括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论、代表作以及有关资料，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专题，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学史问题为对象。

本丛刊由柳鸣九、罗新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

编 选 者 序

柳鸣九

马尔罗是当代法兰西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同时也是当代法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发出一些巨大的声响，它意味着一些“轰轰烈烈”的举动，它在上两个领域里的重要性构成了马尔罗的历史地位。这种重要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又更多一层意义，因为，长期以来，马尔罗被认为是中国1927年革命的参加者，他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两部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而在中法建交后，他1965年以戴高乐将军的特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此后，他又在促使中美建交的过程中，起过良好的作用。

由于以上双重的原因，研究马尔罗的这一课题，早就该提上我们的日程了。

一、他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

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这句话不仅指出了作家的生平与他创作的关系，而且把一个作家的生平在文学上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因此，要认识马尔罗，也许更有必要细读他的“代表作”。

马尔罗传奇性的历史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一、他早期在印度支那富有东方色彩的冒险活动，他在这块法属殖民地对殖民当局的反抗；二、他中期维护正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

争，他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和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三、他后期作为戴高乐将军的重要支持者和助手，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所起的显著作用。

他的“传奇”是从浪迹江湖开始的。1923年，这个22岁尚未成材的文学青年，想象力十足地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远涉重洋，到当时作为法属殖民地的柬埔寨的丛林中，去找一座荒芜的古庙，从那里搞几个雕像，贩运到美国去出售。他要这样做，显然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遭到了破产，“我没剩几个钱了，人一穷，就顾不得选择走什么路”，虽然，他后来曾解释说，此举是“出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强烈爱好”。他周密地准备了这一行动，以顽强的毅力，和他的妻子克拉拉一道，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长途跋涉，通过密林，终于在荒山中找到了那座古庙，留下了“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个非常漂亮的浮雕”。正当这些浮雕水运出境时，马尔罗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扣留并被起诉，他先是被软禁在金边达六个月之久，而后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妻子在巴黎进行了营救活动，争取到文艺界名流对马尔罗“发掘文化艺术财富”的行为表示公开的同情与支援，他自己也在金边法庭上进行了斗争，好容易判决才改为一年徒刑、缓期执行，又经过马尔罗继续上诉，最后判决才被否定。

如果说马尔罗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活动是不值得称道的话（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此举带有考古探险与古艺术品发掘的性质，并对抢救即将泯灭失散的文物客观上有所贡献），那末，殖民当局对马尔罗的追究和加害则是极不公正、甚至是相当卑劣的。他们使用了种种手段，包括炮制“廿年代法国殖民当局为加害一个被告者所惯用的捉风捕影、罗织罪状的材料”，而这，恰巧成为了这个尚未成材的青年人后来成为真正的马尔罗的第一个契机。如果他贩运古物的活动得到成功，他将成为一个幸运的个人冒险

家、艺术文物的倒卖者，但身险图圉的经历却使他亲身体验了殖民当局的横蛮、暴虐与阴险，并亲眼看到了殖民制度的弊端与腐败。对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经历激起了他强烈的反抗情绪和誓与这种制度为敌作对的决心，还使他在遭到官方社会审判与唾弃的过程中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人物建立了关系。所有这些促使他了却了公案、于1924年11月回到了法国之后，又于1925年2月重返印度支那。这次不是为了贩运艺术品，不是为了生活出路，而是为了向殖民当局进行斗争，为“安南人”办一份争取自由的报纸。

马尔罗重返印度支那后的历史，无疑给他的生平第一次带来了真正的正义的性质和英雄主义的格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正义的性质，个人反抗式的英雄的格调。他先与一个热情的有献身精神的民主主义者保尔·莫南办起了《印度支那报》，报纸于1925年6月份创刊。这是一份尖锐、辛辣、富有战斗性的报纸，它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政府中全部的统治者。马尔罗“几乎每天都为报纸的头版写一篇攻击殖民当局某位要人的社论”，揭露他们的“残暴”、“虚伪”与“狗腿子勾当”，指责殖民当局的特务恐怖统治、苛刻的捐税、黑暗的司法制度和种种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劣迹。可以想见，这样一份报纸会激起殖民统治者多么深的仇恨。马尔罗和他的报纸遭到了各种卑鄙无耻的中伤、污蔑和迫害，同时也受到过恫吓和拉拢，而对这一切，他又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与反击。不过，他毕竟不可能跳出殖民主义卑污的池沼，注定失败的还是他这种孤军奋战的勇士。在殖民当局所施加的各种压力和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下，《印度支那报》被迫停刊。然而，具有倔强顽强性格的马尔罗又绕过了困难，办起了第二份报纸《锁链中的印度支那》。最后，当第二份报纸实在办不下去的时候，马尔罗才于1926年1月离开西贡回

国。

人，总是通过实践才确定自己的。马尔罗的妻子克拉拉这样回忆他们的印度支那之行：“我们与人与事进行了真正的交锋，我们自己招惹出来而后又自己承受的那些风险，把我们塑造成形”。从《印度支那报》与《锁链中的印度支那》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个热情、勇敢、有社会正义感、有顽强战斗精神的马尔罗。虽然这个马尔罗并不是革命家，他并不企图推翻整个殖民制度，而只是主张在维持法国殖民统治的前提下，进行开明的改革，但他短短不到一年的西贡新闻生涯，却定下了他前大半生相当激进的基调，展现了他以后作为社会活动家那种独创的实践精神，凝炼了他日后作为法国重要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具有的不同凡俗的眼光和有识之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活动的时代和地区的背景。这时的亚洲，在中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已经成长壮大，在它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在这种条件下，国民党与共产党正进行合作，以广州为根据地，聚集革命力量，准备北伐。中国大好的革命形势对东南亚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支那，民族解放的思潮正在上升，革命组织正在酝酿形成，越南的阮爱国1920年参加第三国际后，为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州组织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马尔罗在西贡办报期间，与越南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力量以及受中国革命形势影响、与广州革命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倾华侨，都发生了关系，在经济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和他们结成了某种同盟，此外，马尔罗的报纸还得到过当地工人劳动者的支援与帮助。这些是马尔罗的亚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这位敏感、聪明、热情的青年人把握到了亚洲脉搏的跳动，使他深入到了真正的亚洲的社会关系中，了解到其中的人与

事，这就构成了他日后亚洲题材、特别是中国革命题材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马尔罗回国后，继续保持并发扬其进步的倾向。整个三、四十年代，他作为左翼作家、作为社会活动家、斗士和英雄，在法国历史舞台上颇为有声有色，并且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谋求祖国解放的事业中，建立了任何当代法国作家都可望而不可即的业绩。从廿年代后期起到卅年代初期，他参加了“争取真理同盟”的进步活动，在文化领域里，他站在维护苏联的立场上，抗议禁演苏联影片和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攻击，公开呼吁警惕德国法西斯势力，谴责与法西斯势力联合对付苏联的阴谋，发起成立“台尔曼委员会”，争取释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为季米特洛夫的释放而奔走，担任“全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以及访问苏联，等等。以这些活动，马尔罗不无理由地自称为“一个革命作家”。事实上，马尔罗也确“曾一度被共产党和反法西斯运动视为他们出色的战友”、“第一流的同路人”，而他这种进步性到了西班牙内战时又发挥出更大的光与热，使他成为一个闪光的英雄。

1936年8月，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支援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叛乱，而进步欧洲则站在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一边。西班牙内战远非西班牙内部的斗争，而是整个欧洲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的一次严重的较量。既然在那些年代里，欧洲范围内哪里出现了作为斗争焦点的社会政治问题，马尔罗就出现在哪里，西班牙自然就成为了他投入斗争的场地。他又要施展他斗士的本领了，在这里，他的确也演出了一番英勇搏击的壮举。他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是革命战争中的军事组织者、指挥员，他从法国征集了廿来架飞机，组成一个飞行中队，他担任飞行中队的领导，也参加战斗飞行。虽然这个飞行中队的条件

相当差，“随时可以起飞的只有六架，能上天的也不过九架”，但它一直活跃在西班牙前线，参加了不少战斗，以英勇善战闻名，并建立了卓著的战功。

同样，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里，马尔罗又再一次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大战开始时，他参军卫国，是装甲部队中一名普通的战士，受伤被俘而又得以逃脱后，他一直伺机投效戴高乐将军以参加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最后，他投向了游击区，参加游击队的战斗。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他是阿尔萨斯——洛林旅的指挥官，他的部队担负了解放阿尔萨斯的任务，并且在1945年斯特拉斯堡的保卫战中胜利地击退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反攻，当地至今仍树有铜牌，纪念阿尔萨斯——洛林旅出色的战绩。战争胜利结束后，马尔罗得到了法国军队首脑拉特爾·德·达西瓦元帅的正式授勋。

这就是马尔罗象一只鹰在欧洲风云中飞翔的经历。当我们看到西班牙战争中战斗机旁马尔罗身着飞行衣的清瘦的身影时，当我们看到两次飞行任务之间紧张的空隙中马尔罗和衣而寝的情景时，当我们看到化名为“贝尔瑞上校”的马尔罗在阿尔萨斯——洛林旅里全副戎装、风尘满面的形象时，当我们看到他在周围人群的鼓掌声中站在军队前列接受勋章的军人姿态时，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文学家、文化人、艺术鉴赏家，而会把他当作一个实践的战士、职业的军人。

战后，马尔罗的地位、作用和形象，都有很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了一个“转折”。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拥有广泛读者的名作家，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着的政治家，一个影响着法兰西政治生活和权力结构的人物，而在政治上，他又已经不再象战前那样带有鲜明的左倾色彩、是苏联与法共公开的盟友，而成为了一

一个保守色彩很浓的戴高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派的中坚人物，成为了苏联的批评者、法共在政治社会活动中的对手，他为抵制苏联与法共在法国的影响、为戴高乐在法国的掌权而竭尽全力。——开始，他就“象皈依宗教似地投身于戴高乐将军的事业”，他最初的支持被戴高乐派认为是“非常及时……加强了我们的行动力量”。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戴高乐内阁中的新闻部长，更成为了戴高乐得力的助手。1946年1月，他又追随下台的戴高乐辞去内阁职务。此后，一直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他都作为戴高乐的忠实支持者参加戴派“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政治活动，为戴高乐的重新执政而作持续的努力。在此期间，他更进一步转向，和他过去作为法共的同路人的历史彻底决裂，并对法共持激烈的反对立场。1958年戴高乐第二次组阁，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后又为国务部长。此后，一直到1968年戴高乐下台，他始终象影子一样追随这位将军，对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包括戴高乐的对华友好政策，毫无保留地、坚决地予以支持，而完全消融了他作为一个独来独往的文学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以至戴高乐讲过这样的名言：“在我的右边身旁，有着而且将永远有着马尔罗”。

至于他在文化部长职位上的政绩，则可说是相当突出，他以一个行家的见识、能力和效率，在法兰西文化生活中留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建树。他大规模地推动考古发掘工作，使古代文物得以重见天日；他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常举办大型的艺术展览会，使卢浮宫珍贵的收藏品在其他一些国家得到赞赏；他收购了不少流失在国外的绘画珍品，又扩大了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他将巴黎的古代建筑全面加以维修，使它们重整容颜；他清点了收藏在法国各地的文物，编制了全国的“文物总目”，建立了完整的文物资料系统；他在一些城市建立了“文化之家”，进一步改善

了外地法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正是由于有了文化之家，巴黎人才愿意在这些城市定居，外国人才不再把巴黎置于法国之上”；他还在很多公园增添了雕塑群像，例如卢浮宫前的菊勒里花园就因他所增添的十多座马雕塑而更为妩媚动人……

马尔罗的一生，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色的活动家、思想家的一生。虽然马尔罗曾不止一次给人以在革命风暴中飞翔的雄鹰的印象，然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他在与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战斗中，并不以推翻整个殖民主义制度为目标，他并不否定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只不过主张作些民主主义的改良而已。至于他那激昂的战斗姿态，也只具有强烈的个人反抗、孤军奋斗的性质。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当然是英雄主义式的，而且，他在这斗争中还曾经是苏联和共产党最好的同路人，很靠近廿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然而，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社会问题上，他归根结蒂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种思想立场使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持赞同的态度，也是这种思想立场使他在战后成为戴高乐派与法共以及左派政治力量进行较量的一个主力。不论对马尔罗一生的经历作怎样的评价，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个卓越的个人，他的经历与所作所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范围里，无疑具有一种不平凡的甚至浪漫的色彩，他每进入一个领域、每到一处、每涉及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都表现得颇为不同凡俗，都大大突破了自己原有条件的限制而做出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来，都达到了一般人所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马尔罗的阶级局限性与他个人的卓越素质的对立统一。

这个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其父不过是一个平庸的生意人，不论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他能得

到什么样的熏陶和培育？他有过并不怎么天真美好的童年，在塞纳河的旧书摊上进行过倒卖书籍的活动，他入世后第一步显然又带有几分江湖气，在一两家不合法的色情书刊出版商那里当助手，而他最初的印度支那之行无疑又具有个人冒险家的性质，而后，他却迅速成长、发展起来，进入了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的领域，并达到了这两个领域的上层，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置身于那些为数不多的搬演人类历史场面的人们的行列。他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世界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除了要归功于马尔罗从书籍阅读、传统教育中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外，他那种进取的精神、倔强的性格、对于有意义事物的敏感以及不满足于自己而不断开拓、不断突破的奋斗精神，就要算主要的原因了，而其中特别是后者，即那种总力求不同凡俗、要做出一番事来，因而走南闯北、看起来甚至有些大胆妄为的奋斗精神，也许更为重要。马尔罗以这种精神取得了成功，他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的精神特征，又正是那种社会条件下自由竞争着的人们最企望具有而又不容易具有的。因为，成功的冒险毕竟只属于少数幸运者，于是，马尔罗就成为了廿世纪法兰西生活中具有传奇性的人物。也正因为他把这种精神特点、这种人生哲学带进了法国文学，所以他成为了这个领域里一个独树一帜、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了解马尔罗其人，就不了解作家马尔罗。这就是为什么安德烈·莫洛亚要说“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的原因。

二、他的创作历程

当然，作家的条件不是冒险经历所能提供的，光凭冒险精神显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更不用说一个杰出的作家了。马尔罗作为一个作家的素养与才能，是他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

如果在杜尔果中学时期马尔罗就如他的教师后来所回忆的那样：“那时他已经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且还有一点领袖欲”的话，那末，他十四岁以前在邦迪小学期间也许早就定下了要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的大志。那时，他以广泛的兴趣和热情阅读欧洲文学史上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从莎士比亚到司各特，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表现出气吞云梦的魄力”。塞纳河岸的旧书摊是他消磨时间的好去处，在这里，他热衷于搜集秘本与善本书；他还对造型艺术有强烈的爱好，常流连于吉梅博物馆、卢浮宫之中，在那里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与精致的艺术趣味。果然，中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开始了独立的“文学生活”，只不过其开端并不十分光彩，但他并没有沉溺在他供职的色情书刊出版商卑污的泥沼里。他结交了法国当代文学界几乎所有最出色的人物：影响巨大的理论家马克斯·雅各布、名重一时的作家纪德、瓦莱里、杜迦尔以及包括立体主义画派的全部创始者在内的一批“风华正茂”、“不顾世人辱骂”的艺术家。他进行“严肃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成为左派文学杂志《行动》的撰稿人，他的评论文章被誉为具有“一种洞察力和特别敏锐的眼光”。1921年，他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纸月》。这部内容怪诞的作品并不成熟，它仅仅标志着马尔罗登上了文坛，结束了他文学生活的准备阶段。从1918年他中学毕业到现在，不论他是怎样没有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但他的才智和博学，特别是对文化艺术史广博精深的知识，已经为当时的文化界所公认。因此，后来马尔罗在西贡吃官司的时候，纪德、莫里亚克、安德烈·莫洛亚、阿拉贡这些知名的作家，在《文学报》上发表声明“自愿为马尔罗所具有的智慧和实际的文学才华作担保”，并预言“以他的年青有为与成就，可以对他寄以厚望”。总之，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文化素养，但他

要成为以后那位独具一格的大师，还缺乏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精神，缺乏一种引人深思的哲理，当然更缺少有丰富社会内容的生活经历。

这一切，他的印度支那之行似乎都给他提供了。从这一段经历中，他冶炼和形成了他那开拓进取、奋斗冲闯但又多少流于赌博性的精神特征。他获得了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冲突为内容的东方异国题材。他从亚洲的现实中，从他作为一个欧洲人在亚洲的经历中，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深切地理解了人类的状况。他捕捉和搜集了印度支那阴暗的社会现实的景象、崇山峻岭的气势和密密丛林中葱绿的色彩。现在就看他以什么哲理把这一切加以统率，以什么精神的“乳酶”来使这一切进行化合了。究竟是什么哲理呢？

1925年12月，马尔罗最后告别了亚洲，回国途中，他在甲板上开始写他的《西方的诱惑》。这本出版于1926年的书，早已隐没在马尔罗后来所写的那些著名的小说的后面，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何况，它在文学上还不够成熟，其中作者的“语言的表达与天马行空的思想是不相称的”，但也许只有它，才提供了马尔罗的哲理、贯穿于他小说中的哲理的一把钥匙。

这部书信体的作品，类似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它通过一个中国青年与一个法国青年在对方国家里旅行时互相通信的形式，把东西方文明与世界观加以对比。深深的悲观主义，是这本书的基调。在作者眼里，不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遭到了价值危机，都走向没落衰亡，西方文明所在地欧洲，是“一座大坟场，整个世界处于阴风怒号的沉沉黑幕之中”，而人类则眼见主宰着生活的是“一种本质的荒诞”。马尔罗在这本书里所说的“荒诞”，就是人类生存的荒诞，直接来自他所引用的十七世纪哲学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的荒诞性的描绘：“请设想一下，戴着

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西方的诱惑》中对人类生存荒诞性的根本理解，构成了马尔罗的哲理的基础，它在廿世纪法国文学中具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是本世纪作家第一次对“荒诞”的揭示。

于是，马尔罗开始从他的哲理出发，构思他的小说。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哲理，此后他的小说中才出现了贯穿一致的主题：人对生存荒诞性的反抗和挑战，虽然这些小说的题材不一。只不过，奇特的倒是，马尔罗此后第一部小说《征服者》和奠定他文学地位的主要作品《人的状况》，竟然都是以他并不熟悉的中国革命为题材。《征服者》出版于1928年，直接描写了1925年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始末以及围绕这一事件广州革命政府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人的状况》出版于1933年，同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它以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到同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血腥屠杀这一个时期里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为内容，同样也直接描写了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中各种人物的活动。

马尔罗一生的冒险行为可谓不少，但他最大的冒险也许要算他用中国革命的题材来进行文学创作了，而且，他还是以熟悉中国革命内情的人的身份来进行创作的！他的《征服者》与《人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宣布了他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或目睹者，而他的小说只不过反映了他的亲身经历而已。所谓马尔罗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曾任广州革命政府中的“宣传部长”或“特派员”之类的传奇，即由此而来。不仅如此，“马尔罗本人在传说的编造中也起了作用”，包括故弄玄虚的谈话、默认、肯定、暗示、讳莫如深，等等。甚至还有这样的

事情：“1937年，当托洛茨基指责他‘为扼杀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国民党服务’，或当罗歇·加罗迪把‘导致工人群众被屠杀的那场冒险的肇事性的广州起义’归罪于他的时候，他都宁可受冤枉而不出来澄清事实真相”。

实际情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马尔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这一历史真相在法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确认。马尔罗的日程表明，他第一次印度支那之行，因刑事问题而几乎完全被困在金边，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的第二次印度支那之行，从1925年2月来到西贡直至同年十二月被迫离开，他一直在当地办报，只是在这年的八月到香港购买过报纸的印刷设备。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几天中，他亲眼看到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他真正第一次到达中国大陆是1931年的事，他的传记作者若望·拉古杜尔以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他1961年以部长身份访华以前唯一的一次中国大陆之行”，而且他是作为旅行者在作环球旅行，中国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因此，《征服者》与《人的状况》中所描写的中国生活与斗争，只是建立在马尔罗在西贡办报时期对左派华侨的了解、他在香港短暂停留时以及在中国旅行时对中国生活景象的感性认识、当然还有他从报刊上所获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知识这些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这两部小说在对中国革命的描写上有着根本的缺陷。也许正因为《人的状况》是写作于马尔罗真正到过中国一次之后，所以，它在描写中国生活的浮光掠影时，又显得比《征服者》稍为真切。

在《人的状况》出版之前，马尔罗1930年发表的小说《王家大道》，倒的确是一部以他自己的生活和实感为素材写成的作品。小说写两个冒险家各自在印度支那山地丛林中的“赌博”，克洛德为了盗取古寺的石雕，佩尔肯为了在山林的土著部落里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两个人物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想感

情、愿望意图，都是马尔罗式的，特别是克洛德冒险活动的种种细节：牛车所组成的车队、艰苦的行程、寺院的废墟等等，更是与马尔罗本人在印度支那丛林中的经历几乎完全一致。整个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生动真切的形象，而人物那种不同于一般人的性格特征，那种强烈的征服欲以及为实现这种欲望的勇敢、坚毅，还有东方丛林中紧张的冒险情节，又给小说带来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小说出版后，当年即获得文学联合奖。

西班牙战争给马尔罗的生活历程充实了新的内容，也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与新的题材。从西班牙前线回到法国不出一年，他发表了另一部重要的小说《希望》，直接以他在西班牙的见闻与感受，描写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小说中所呈现的一幅幅生动的西班牙抗战生活的图景，所叙述的西班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国际纵队一个个动人的战斗故事，构成了对西班牙战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形象的再现。由于马尔罗本人是西班牙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带有自传的性质，小说中所描写的国际纵队的生活与战斗，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生活经验为蓝本的。也正因为这部小说是建立在马尔罗本人丰富的战斗生活和他在火热斗争中深切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所以其中充满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即使是对某个生活细节的描绘，往往也凝聚了作者大量的观察与感受。毫无疑问，《希望》可以算得上是本世纪西方文学中最为杰出的战争小说之一。小说出版的翌年，马尔罗又把它改编成电影《特鲁埃尔山》，由于它进步的革命的内容，影片被法国政府禁止公演，直到战后1945年才得以与观众见面，并获得了德吕克奖。

《希望》之后，马尔罗的小说创作生涯趋向终结，此后，他只在1943年发表了《与天使的斗争》的第一部《阿滕堡的胡桃

树》。这部小说是马尔罗创作生活的转折点，在这里，革命的主题和激情都消失了，作者转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上表现“基本的人性”。小说的主人公有好几个，作者轮流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他们身上。作品所描绘的地理空间也很广泛，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洲。不过，作者的注意力并不在于广泛表现社会现实生活，而陷入了一些抽象的哲理，如历史的发展、人的概念和艺术的作用等等，而这，正预示着马尔罗战后由小说创作向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的过渡。

对造型艺术，马尔罗早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广博的知识和浓厚的兴趣，战后，他文学艺术活动的重点转向了这个领域，接连写出并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论著：《电影心理学大纲》（1946）、《艺术心理学》三卷（1947、1948、1949）、《论戈雅》（1950）、《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三卷（1952、1954）、《众神的变异》（1957）等^①。此外，马尔罗战后还发表了一些散文与回忆录，如《反回忆录》（1967）、《砍倒的橡树》（1971）、《黑曜岩之首》（1974）、《拉扎尔》（1974）、《过客》（1975），只有《不朽》是他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出版的。

从马尔罗整个文学生涯来看，他的成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他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艺术史论著，这两个部分各自在法国当代这两个领域里所占的地位和所具有的分量，都是令人瞩目的。当然，他的回忆录特别是他的《反回忆录》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其中涉及到

^① 马尔罗的艺术论著，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叠。《艺术心理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想象中的博物馆》，第二卷为《艺术的创造》，第三卷为《绝对的硬币》；而后出版的《沉寂之声》，是《艺术心理学》三卷的重复；《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共三卷；《众神的变异》则为一卷；1963年出版的《想象中的博物馆》系《艺术心理学》第一部分与《沉寂之声》的改写，